

「跨學科視角下的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歷史、文化、經濟及公共政策
會議紀要*

林皓賢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前言

香港地區在 1841 年未被英國佔領前已經出現出一種二元的發展形態，一方面以圍村、宗族為核心的農耕發展社區，另一種是以漁業為主的村落社區，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英國管治時期，香港逐步成為國際商港、金融中心，從此又發展出更多的社區面貌。以往對於香港研究的關注點多集中在開埠以後的歷史發展、經濟發展及英國管理政策等幾方面，雖不算過於狹窄，但較著重於大歷史、大事件。多元發展一向是香港社會的特點，近年香港研究開始向不同領域推進，如歷史人類學的角度進入鄉村、社會學的角度再看工業發展、另外還有地區歷史的整理、古代香港地區歷史的重構，以及以往較少人處理的課題如體育、醫療、華人宗教等，香港研究開始百花齊放。有鑑於此，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聯合籌辦「跨學科視角下的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召集香港研究中不同領域的學者，展示現時各科中的香港研究前沿成果，同時探討各領域的香港研究的會否有共同點，以推動香港研究，甚至發展香港學的可能性。是次研討會分為兩天舉行，第一天（2023 年 6 月 23 日）於香港樹仁大學研究院綜合大樓舉行，及第二天（6 月 24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與伍何曼原樓進行。

本次會議設有十二大專題，第一天的專題討論有「公共政策（歷史）」及「公共政策（當代）」、「戰時戰後的香港」、「非遺歷史與政策」、「文學與觀光」、「身份認同與書寫」、「體育與康樂」、「社經與對外關係」八個專題小組。第二天的專

** 特別鳴謝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方子聰同學協助整理是次紀錄。

題討論則有「香港公共史」、「香港與國學」、「新界政策與發展」、「香港思想史」四個專題小組。與會者來自香港、台灣、內地、歐美等地大學，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輩學者參與，也有年輕的學人發表個人研究引導深入思考，現按論文內容分類綜述於下。

一、公共政策（歷史）

第一組由陸志鴻教授主持。陳家樂先生在“Housing Inequality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colonial Hong Kong”中探討了殖民主義政治轉型過程中國家權力如何塑造香港的住房供應，他認為住房不平等的制度結構在 80 年代得到鞏固雖然有一定程度上由於新自由主義在世界的傳播，但城邦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驅動與主權變化有更直接的關係。康皓雲先生在〈糧食供應的管理：戰後初期香港的官米進口政策（1945 至 1954）〉中以食米供應作為觀察對象，並從「如何進口官米」角度切入，利用戰後初期的相關檔案，探討了十年間香港殖民政府如何應對戰後多變的政治情勢、英國政府的政策指導、國際組織與他國政府影響以及自身需求等制定香港的官米進口政策，他認為香港殖民政府存在著操作的空間與彈性。香港雖在大方向上，與英國政府的目標一致，但由於香港需要自負盈虧，在進口食米與倉儲所帶來的財政壓力下，香港殖民政府會選擇拒絕英國方面的建議。在維持食米穩定供應的前提下，盡量減低財政負擔，即為香港米糧管制的宗旨。許家朗先生在“From Colonialism to New Managerialism - Changing Meaning behind Hong Kong’s Attempt to Land Titles Registration of a Century Apart”中以《土地業權條例》及《1902 年新界業權條例》兩項法律特點切入，探討它們在哪些方面比契約登記更好；同時，他亦探討上述兩條法律背後的理據以及未有實現的原因，意在揭示全球史背景下形成的不同基本治理意識形態，以及法律問題與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交織在一起，導致需要用全新的系統取代現有系統複雜性的現象。陸志鴻教授在“Chinese Waterborne Communities in the Colonial Official Writings of Nineteenth-Century Hong Kong”中針對總登記官 Samuel T. Fearon，蘇格蘭人

James S. Lockhart 以及先後為傳教士及香港教育督察的 Ernest J. Eitel 三位漢學家的論著，關注十九世紀香港殖民政府中的歐洲漢學家官員在調查或文字報告中對於水上人、蟹家船女的說法。他指出，這些漢學家官員對船民及其船隻的理解是英國人對中國及其人民的了解的一部分。

二、公共政策（當代）

第二組由曾俊基博士主持。李彭廣教授在〈英國治港的解密文件研究〉中首先以解密文件，如前港督麥理浩履任前所寫的治港方針作為切入點觀察港英政府時期的官僚體系，指出麥理浩有意透過社會改革與刺激經濟發展使得香港與中國沿海城市脫鉤，增加日後續借香港的籌碼；其次點出智囊團集中於倫敦而非各地皆有的框架體系，先由總督總理本地情報，上報英國外交部進行區域性情報網統一整理，再上報倫敦總部處理後發電報直達總督之手。緊接著是胡嘉賢、李樹甘教授的〈香港與大灣區融合研究〉以及曾俊基博士的“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Gain of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兩份報告均針對大灣區和香港的經濟聯繫進行了一些探討，其中曾俊基博士修訂自己和與李崇高教授在 2020 年提出的城市區域結構效率分析框架，預測潛在收益。他透過 2026 年中國 322 個城市的數據，認為若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潛在收益為大灣區 9+2 城市及周邊城市總收入的 22.87%；若大灣區成功進行知識共享，達至經濟一體化，將進一步為大灣區 9+2 城市帶來總收入 48.59% 的潛在收益。另外，李崇高教授在其報告“Assess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Public Acute Care Hospital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中評價了在 Covid-19 期間公立醫院的效率，他運用了自己與伍凝珠教授的研究基礎和自己與鄭毓盛教授描述的結構效率模型，他認為 COVID-19 對整個香港公立醫院系統造成產能過剩，而醫院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是個別醫院內部效率低下，但整體而言在疫情前或期間的資源分配是有效的。最後，蘇偉文教授在“Public Finance of Hong Kong: Some Stylized Facts”中提出了一些關於疫情後管理香港公共財政的看法以及正面臨的

事實，他先提出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及制度設置限制了香港在公共財政中運用各種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能力，再指出香港經濟嚴重依賴貿易和國際金融，容易受到全球經濟下滑、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自然災害等外部風險的影響，最後指出香港面臨老齡化的嚴峻社會狀況，必將對香港公共財政構成挑戰。

三、戰時戰後的香港

第三組由鄺智文教授主持。朱重源先生在〈論香港 18 日戰爭中的華軍援港〉中藉助報章、回憶錄、日記、中西外交檔案等探討香港抗日 18 日戰爭中國民政府軍隊援助香港的可能性，同時討論前人觀點及無法成事的原因，旨在增加對香港保衛戰及華南地區抗日的認識，甚或影響對於國民政府及港英政府在二戰的表現評價。鄺智文教授在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tate in Hong Kong: New Insights from the Spatial History Perspective” 從空間史研究角度出發，利用地理信息系統探討日治下的香港如何營運並支援日本的戰爭，指出日本透過武力和空間管理以控制人口增長及資源消耗，及扶持合作者減低佔領成本，不過日本軍政府的政出多門，分工不明導致缺乏協調的困境。蘇嘉誠先生在 “Shadow Economy and Underground Networks in the Early Cold War Hong Kong” 中探討韓戰期間香港的影子經濟，以動態、連通性和相互依賴的形式識別全球經濟的影子結構；另外，他以全球視角審視香港作為冷戰城市的複雜性，點出香港是影子經濟的交匯點和接觸區，且由於地緣政治、合法性、殖民性、全球緊張局勢以及與海上人民的聯繫的疊加而重塑了香港的邊界，印證了香港是多邊關係壓力下的結果而非「東方柏林」的簡化形象；在這項研究後半部分中也揭示了全球經濟如何始終相互聯繫。重疊的地下聯繫正將全球經濟塑造成一個具有活力的體系，且保持運作。最後代入到現代的中美博弈，他認為兩國相互聯繫，與世界其他體系聯繫在一起，將呈現對國際關係的另一種理解。最後曾樂濱先生在 “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 Second World War Memorial Sites as Dominant Lieux de Mémoire in British Hong Kong, 1945-1997” 中以檔案材料為背景審視 1945 年以來社會政治發展的背景下在香港設立二戰紀念地的過程，以及香港變遷下這些地點與特定社區和一般社會

的關係。他認為英國是為重建統治合法性和促進自治而建立戰爭紀念空間，這些紀念場所屬於「主導性記憶所繫之處」，然而公眾漠不關心，即使歸屬感日益增強，他們對保衛香港的記憶的了解與興趣仍然有限。

四、非遺歷史與政策

第四組由傅蘭思教授主持。霍揚揚博士在“Empowering Cultural Identity - The Living Intangible Heritage of Contemporary Boat People Community in Tai O, Hong Kong”中針對大澳的土地公誕慶，調查大澳船民社區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後，分析自漁業式微後的當地水上人對於自身文化認同的憑藉，提出當地人將土地公誕慶重新組合、復興和傳承為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並得到船民社區成員的積極參與，在一定程度上以文化維繫了水上人社區及鞏固了身份認同。黃浩庭博士在〈明清東亞陶瓷貿易圈與香港大埔碗窯再議〉中以陶瓷器作為媒介，探討景德鎮、福建、廣東地區窯業經營與陶瓷器運送的模式，重新審視大埔碗窯的產品和市場特性。他針對大埔地區出土的瓷器殘片與澳門出土的外銷瓷不同的特點深入研究，歸納出大埔碗窯雖依存在廣州地區經濟體系，但它所產出的產品多為生活所用的次品而非外銷的上等貨，其市場面向也是國內而非國外。羅樂然教授在〈傳統再造與保護村落——香港村落的地方非遺展現〉中以石澳、薄扶林以及深井三個村落及其背後傳統文化繼承作為觀察點，分別以天公誕、大坑舞火龍和「石澳是我家」三大主要例子，分析村落非遺文化的展現及保護措施。傅蘭思教授（Prof. Florence Padovani）在“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stakes: the transmission issue in Hong Kong local communities”中進一步關注香港基層的非遺文化傳承問題，前半部分回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及定義；後半部分以麒麟舞及盂蘭節作例，指出地方組織或社區可以對非遺文化傳承發揮重要作用；最後部分也有反思如何幫助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使其避免陷入過度市場化的陷阱。彭淑敏教授在〈香港籐器製作：集體回憶與工匠精神〉中探討作為集體回憶的香港籐器的製作發展史，指出籐器製造業以廣東興寧人為主，從東南亞進口原材料，

並在二戰前成為重要產業，在戰後也迅速復興。她也補充了不少藤業細節，如編織方式繁多、香港曾日均生產藤椅 4000-5000 件、貿易外銷以美國最多等，最後部分整體分析自戰前到 80 年代起式微的藤業師傅表現出的的工匠精神。

五、文學與觀光

第五組由常慧琳博士主持。黎馨營小姐在〈兩代人的城市圖像——論《對倒》與《花樣年華》的香港書寫〉中以劉以鬯的《對倒》及王家衛執導的《花樣年華》為例，從三代作家的身份歷程切入並置梳理劉以鬯與王家衛的成長及創作歷程，關注他們如何將「身份認同議題」投射到作品之中；其次分析兩部作品中對於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建築空間，最後以身份探尋角度探討兩位作家如何藉助回憶觀照香港，分析背後的移民情結與本地認同形式。梁文棟先生在〈探析西西詩歌中的「童心」：以《不是文字》為例〉中針對西西的《不是文字》，以「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及「精神分析學」為基礎，探究西西詩歌中「童心」的表現，並探討在詩歌中如何呈現香港本土文化以及通話敘事，嘗試寫出西西詩歌中的童心傾向，比如運用佛洛伊德的「本我」分析〈看的故事〉。凌頌榮教授在〈試論宋王臺意象在香港古典詩歌（1919-1949）中的轉變〉中論述了 1919-1949 年間宋王臺意象在香港古典詩歌中的變化，他指出意象對香港歷史發展而轉變，遺民的語境逐漸退卻，取而代之的是對歷史流轉的感慨以及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創傷。最後余文翰教授順應「文學散步」風潮，在〈香港「南區文學徑」與文學觀光〉中介紹香港文學觀光與寫作的相輔相成，在文中他歸納出三項經驗：其一，既要為文學觀光創設可供遊覽的地景符號，又可將符號的意指過程融合進更為積極主動的再創造；其二，避免孤立看待文學地景，應將其融入本地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再嘗試對外推廣，期間，舉辦節事活動是整合資源、形成文化品牌較快捷的策略；其三，就創設文學地景的實際運作而言，由地區性團體或官方部門牽頭並居中協調，以便更好地調用政府、學院、民間資源。

六、身份認同與書寫

第六組由許明德教授主持。陳奕恒先生在“Muting Dissonance: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on Rock Spirit narrative via Newspaper Articles”中探討「獅子山精神」為何在塑造香港人的公眾記憶和身份方面較為突出。他最初指出這種精神最早出自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的財政預算案，梁錦松將獅子山精神詮釋為刻苦、團結與勤奮。其次，他統計並分析了報章中對於「獅子山精神」或「獅子山下精神」出現頻率及其隨附的內容範疇，他發現獅子山精神與政治及社會辯論有關，並受到建制派影響較深；而其頻率及使用也與每個時期正進行的社會或政治議題息息相關。許明德教授從《男燒衣》及南音入手，在〈視聽與文字的多重變換：從南音與電影《男燒衣》談起〉中分析視聽與文字的交融，他認為口述文化重在記憶詞彙的重複，書寫文化則提供了更多餘暇時間進行思考。另外，他重點比較《男燒衣》在南音的結局及李碧華為《小說家族》改編的《男燒衣》結局，並逐一分析背後含義與作用的不同。湯中杰先生在“Foreign Places and Landmarks in Cantopop Lyrics: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kongers’ Overseas Imagination 1970s–2020s”中分析 1970 年代到 2020 年的粵語歌曲中對於外國地點或地標的作用、粵語流行曲對不同時代香港人的意味以及這些想象的轉變如何反映本地社會變化。他認為 70 年代的外國地名多用於襯托香港的美好；80 年代以後主要是陳少琪與達明一派開創填詞的空間實踐派，其著重描寫都市的日常角落；後來興起日本風與歐洲風，但都屬於間接的想象，填詞人開始運用陌生化手法，如運用和式漢字填詞。1998 年起由於香港國際機場的建成，歌詞逐漸開始寫實或者契合當地社會的政治形勢。最後黃樂怡博士在〈香港多元價值觀的體現——淺析《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篇章目錄》〉中以「香港人」為切入點，說明「多元」為何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再從《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篇章目錄》所選篇章特點分析為何近代大學新生抱有「五四之後沒作家」的觀念，評價所選篇章是否足以呈現香港的「多元」特質。

七、體育與康樂

第七組由林皓賢博士主持。董顯亮博士在〈置疑免疫共同體：《一個懷疑論者的家》的創作與表演〉中從劇場《一個懷疑論者的家》切入，從置疑疫苗共同體的群體想法、「陰謀論」以及空間運用三方面分析，首先以邊緣者視角打破固有的「偏執」觀念，指出不打疫苗及打疫苗的其實均屬於一種「偏執」；其次重新審視「陰謀論」的定性，他認為「陰謀論」是一種評價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最後析述如何透過黑盒劇場與方艙醫院的相似空間與舞台設計使表演者重現疫情下的生活。林皓賢博士在〈港英時期的體育活動與城市管理〉中以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節、體育節及青少年暑期活動等三個案例分析港英時期的體育政策思考、體育盛事與城市管理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港英政府所推行的體育政策與體育活動帶有政治目的，是作為政府整合與穩定社會的重要工具。梁耀堡先生基於遠東運動會中香港人代表民國政府參賽，在〈從遠東運動會探討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中探討參賽遠東運動會對於國族身份認同及「體育救國」概念形成的作用，同時也梳理出歷屆運動會的簡介。他指出最早在香港提倡「體育救國」的是南華體育會，它們志在凝聚海外華僑的國族身份認同。李新元先生在〈殖民地童軍發展之比較——以台灣和香港為案例（1910-1970）〉中比較論述台灣與香港在殖民地時期的童軍發展，觀察華人群體如何逐步接納童軍成為本土文化一部分。他指出，香港和台灣透過童軍建立自身的青少年教育與公民教育體系，進而重構與再詮釋自身社會文化之精神，既抱有自身文化特色又可與世界對話。最後岑卓成先生在“Manifesting Social Justice with Chinese Religion and Hardcore Punk: The Sonic Exorcism of Hong Kong’s Rokkasen”中以六歌仙的《望月有感》入手，分析中國宗教、社會正義以及獨立音樂在反修例運動中的交叉點。他認為六歌仙的《望月有感》在融入道教元素之餘，透過音樂傳達了有限但廣泛的反建制憤怒。

八、社經與對外關係

第一天的最後一組由楊偉文先生主持。蔡思行博士在〈英佔香港不是一般意義下的「殖民地」：英國與中國的視角〉中重新以英國及中國視角論證香港並非一般意義下的「殖民地」身份，以中方角度，他提出 1972 年 6 月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將香港、澳門剔除殖民地名單，意為非殖民地身份；至於英方角度，他引用《殖民地規例》，認為香港在 1985 年前由於沒有設置立法局，不符合規例中直轄殖民地的後綴；因此，在 1985 年前的英國角度與中國政府立場不謀而合，推翻了「殖民地」說法。王耿城先生在“S. Moutrie & Co. in Hong Kong”中利用本地英文與中文報紙上樂器商謀得利商行的公司廣告及記錄，研究其在香港的業務發展，嘗試歸納出謀得利商行如何通過香港維持區域業務，並試圖揭示香港音樂和音樂品味的發展以及英國企業如何影響香港當地經濟文化。楊偉文先生在〈中美博弈對聯系匯率的影響和對策：一個「狐假虎威」的貨幣問題〉中回顧香港匯率制度及國際貨幣制度變化下各國中央銀行對變化的舉措，他認為聯繫匯率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匯率制度或貨幣政策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高度政治化和戰略意義的管治問題，需要未來透過金融學、經濟學、社會科學以及哲學的融合運用達到為香港的貨幣體系改革和經濟發展策略作出有實用性的建議。最後，袁偉基教授在“The impacts of Hong Kong's changing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city's econom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cies”中分析香港人口結構變化對於城市經濟、文化及公共政策實施的影響，他指出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增加及產出減少，並反思過度輸入外來人才的負面影響；至於文化方面，由於不同國家移民湧入促使文化多樣性，不同文化習俗融合加深香港的文化遺產；最後在公共政策方面，他建議促進經濟數字化，透過投資 AI、機器人來提高服務業的自動化程度。

九、香港公共史

第二天會議承接第一天流程，第九組由潘淑華教授主持。陳文妍博士在〈口述史與香港歷史記憶〉中討論口述訪談與香港大眾歷史記憶的形成；她率先介紹口述歷史發展以及口述史對於保留香港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其次分析歷史文獻記載和不同年代認識對於遷移故事論述的差異，梳理香港社會塑造歷史記憶的過程和變遷。黎佳恩博士在“Public Libraries and Reading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 Reading by the Masses in Hong Kong (1962-2020)”中針對1962-2020年間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閱讀推廣活動和計劃進行歷史記錄，分析香港大眾讀書概念的發展，而是次報告的重點關注方向在公共圖書館的發行率和公眾閱讀時間的變化。文末他闡述其觀察：其一，昔日閱讀文化的盛行主要由於對知識的追求，使用者希望學習一些實用的東西來提高他們在特定領域的技能並解決問題，而近代社會則是「不閱時代」，大幅減少閱讀時間；其二，他指出家庭圖書館的設立或家庭閱讀風氣對於培養閱讀習慣有積極影響。黎善珩先生在〈社交媒體上的歷史專頁對香港史推廣的功能與局限〉中介紹以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YouTube 為首的社交媒體上的歷史專頁的背景故事，分析這些歷史專頁對於香港史推廣的功能與局限，優勢方面，有靈活課時與學習時間、不拘課室與學習空間、彈性課程與學習內容、貼近生活的教材與學習材料以及實踐「去中心化教育」；局限方面，則有教育結構鬆散、內容真確性存疑、社交媒體本身限制三點。李滢銓小姐在〈市場產品或是社會保障：香港僱員補償制度的歷史回顧〉中針對香港僱員補償制度發展——從成立之初、四十年代對私營保險為工傷賠償制度的利弊討論以及香港各界對成立中央補償制度的訴求和爭論——進行了系統性的歷史回顧，她點出香港最初的僱員補償制度沿用英國的棄案，並且本地立法嚴重拖後的歷史事實，並在文末對成本效益進行深入反思。

十、香港與國學

第十組由許建業教授主持。許建業教授及謝向榮教授分別在〈觀念、定量與新文化史：香港地區詩歌總集研究回顧〉和〈近五十年來香港《左傳》學研究述要〉中對香港地區詩歌總集以及近五十年來的香港《左傳》學進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回顧，其中謝向榮教授針對其恩師單周堯教授的《左傳》研究，從「學術研究」、「文化傳承」兩方面概述。林傳濱博士在〈香港古典詞學理論研究初探〉中初步梳理了 1950-2020 年間香港古典詞學理論研究的發展情況，同時指出不只有從《人間詞話》到清代詞學的研究轉向，還有重視音律、結合西方理論、研究人員的多元化和學院化等特征。黃偉豪教授在〈《中國文選》論戰懸案始末與英殖香港五六十年代國學風潮〉中考察 1956 年至 1960 年左右《中國文選》在《華僑日報》上的論戰，分析因此儼如忌諱般的論戰背後帶動的英殖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國學風潮，他認為這次論戰涉及學院派與民間派在中文、國學乃至意氣上的鬥爭。

十一、新界政策與發展

第十一組由羅永生教授主持。陳嘉渭小姐在其論文“**Tai Po Tou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i Po Market based on travel notes (1929 – 1934)** (大埔遊：從遊記考察 1929-1934 年的大埔墟)”中通過兩篇的遊記，還原了 1930 年代初，香港以及廣州旅客遊覽大埔墟的概況。並揭示了自九廣鐵路英段通車以來，大埔如何利用自身獨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成為當時的旅遊熱點。鄭世亮先生在〈補價升糧：殖民管治下的新界地政管理源革（1898-1997）〉中梳理了殖民政府治新界的經歷，透視 1898 年前新界地區盛行的土地使用習慣、由「補價升糧」的地政管理概念發展成的而「新界小型屋宇」行政程序以及戰後開發新界帶來的地政改革三大向度，並旁及探討地政管理改革對原居民的塑造和創造——即鄉議局的出現。郭嘉輝博士在〈從《同治十二年買賣田土及村事糾紛》看晚清新界的基層治理與司法〉中以《同治十二年買賣田土雞村事糾紛》殘餘訴訟文書以及稟狀等

入手觀察晚清時期新界的治理及司法制度，他重新審視「皇權不下縣」這項命題，旨在呈現律法在鄉村的執行、官紳衝突以及縣治與鄉村基層管理的真實情況。呂卓遙先生在〈戰前交通現代化對沙田鄉村打醮的影響〉中針對 2016 年沙田田心村打醮分析其中的宗教禮儀、世俗規範與村際關係。他亦嘗試分析九廣鐵路、大埔道及山徑如何對沙田鄉村打醮文化造成影響，觀察人與物的流動。最後，他結合田野考察、檔案、文集等，引入施堅雅的集市理論，重塑並填補戰前沙田鄉村社會的轉變，以及分析如何呈現在太平清醮之上。

十二、 香港思想史

最後一組由張曉宇教授主持。張琬瑩教授在〈因『事』明『理』：劉百閔在香港大學的經學教育及其《易》學思想〉中從敘述劉百閔早期求學、交游與從政生涯分析劉百閔的思想脈絡；同時整理了他在教學期間編撰的經學講義，從中發掘其教學內容即旨趣；另外，從其著作《周易事理通義》以及《易事理學序論》中分析經學於民族文化使命感的關係以及考察他如何將西方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知識灌注交織於傳統經典的詮釋，探求「理」和「事」的統合。鍾泓泰先生在〈余英時香港時期（1950-1955）閱讀史〉中分析余英時在港時期的閱讀習慣，並從其作品分析閱讀和思想形成的關係，從而重塑其學術思想形成過程。他指出英、美兩國為對抗新中國的政治宣傳在香港建立圖書館，讓余英時能借閱大量的英文書籍，與南來學者的交流讓余英時有了新視野。劉健宇先生以僑校為例，在〈反思香港教育商品化——以二次大戰前香港教育史為例〉中反推二戰以前的香港教育已經存在教育商品化現象，通過香港僑校及東南亞的華文報章及刊物，考察二戰前知識分子對教育商品化的認識與批評，從而印證教育就是商品的觀點。容啟聰先生在〈流亡知識人的中轉站：冷戰時期香港的地位與華裔學人的在港生活〉中初步探討流亡華裔學人在港生活，他指出流亡知識人海外離散是複雜議題，故在是次研究中嘗試以不同學者為例追蹤其流亡經歷，分析他們將香港視為「中介之地」——香港學者冼玉儀認為自晚清開始香港已是中國人移居海外稍為歇腳，

然後繼續旅程的地方——亦或是「過渡空間」——美國學者杜贊奇提出，他認為香港是一個開放，並且沒有固定身份認同的地方——的地位變化，比如屬於「中介之地」範疇的陳少白、康有為等；屬於「過渡空間」的一批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孫寶剛。

結語

本次研討會旨在促進來自不同地區、大學的學界同仁對於不同角度的香港史課題進行初步討論，並發表個人的見解，形成深入而多元學術交流。

整體而言，為期兩天的研討會討論熱烈、內容多元，充分展現「跨學科視角下的香港」的方向，除歷史學外，亦包含了經濟、政治、文學、音樂、軍事、社會文化等方面。不僅如此，學界後進們也能在研討會中得到前輩們的專業評價和意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參與會議的年輕學人，他們的課題內容甚具趣味和啟發性。未來若能繼續有此盛會，加之以多些單位一起合作，必能使得各學友的成果傳播更廣，及促使香港史研究領域之拓展，促成更多合作與對話的機會。